

三星堆上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肖林、童芳

“月光宝盒”、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去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数件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地区文明早期交流互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 and 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开展发掘，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前所未见“神器”

走进三星堆考古大棚，记者看到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已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重要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

站在7号“祭祀坑”旁，眼前是一片青绿色，可谓“琳琅满目”。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的特点是玉器多、小型的青铜器多。玉器包括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琰等。铜顶璋龙形饰、青铜立人、铜铃等青铜器虽然小件，但却精巧。其中一件不到10厘米长的青铜凤鸟，羽翎根根分明，是体现古人高超铸造技艺的杰作。

在这么多小件文物之间，一件椭圆形网格状文物尤其显眼，这是7号“祭祀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黎海超把它称作“月光宝盒”。

“非常震撼，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样的器物，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黎海超告诉记者，这件文物上有丝绸痕迹，外层是上下对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一侧类似合页，还附带了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根青铜飘带，最让人称奇的是，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玉器，相当于一个裹着丝绸的精巧铜盒里装了一块美玉。

考古方舱内，与7号“祭祀坑”一门之隔的8号“祭祀坑”，特点是大件青铜器多。三星堆典型的青铜人头像目前就发现了近70件，比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加起来数量还要多。

除了今年初已经公布的铜龙，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簪等，其中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

在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眼里，铜神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鸟(6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立人像(6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兽(6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它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的人对世界的理解。”赵昊说。

这件文物去年已经被发现，经过数月小心翼翼地清理，它复杂精美的构造显露出来。青铜神坛由低到高分三个部分，底部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上一个平台，平台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人，五络立发，身着飘带彩衣，脚踏云头鞋。还有一组高大的“力士”分别跪坐在一个刻有纹饰的小台基上，合力扛起一只小神兽。小神兽背上还骑着一个穿裙子的人，小神兽脖子被三股铜丝做成的绳子拴起来，绳上扣有一个精巧的小铜环。

“7号、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左一)在和工作人员交流(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种类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那么夸张的人像造型，那么奇特的文物，之前3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文物直接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奇奇怪怪”。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学家经过对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仔细研究判定，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

以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为例，整件文物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壘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熊形尊。

冉宏林告诉记者：“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三星堆新发掘6个“祭祀坑”中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甗等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

月形地带有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先民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在精神信仰方面相似。

“三星堆造型奇特的文物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体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说。

待解之谜

考古发掘紧张推进的同时，文物保护修复与多学科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据了解，包括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了三星堆的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

经过精细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此前3号至6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口尊、圆口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黄金面具等一批“重量级”文物已经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截至目前，已有77件青铜器，120件玉石器，44件金器，678根(段)象牙，46件象牙雕刻残件得到了清理修复。

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通过植物考古，科研人员在4号“祭祀坑”里发现了竹子、芦苇、甘蓝、大豆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动物考古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8个“祭祀坑”周边，考古学家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瓿、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冉宏林告诉记者，以上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对三星堆祭祀区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延续年代等问题也已基本清晰。然而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从事祭祀活动的高等级人群的情况，对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想要更多地了解三星堆人生在哪儿，死在哪儿，祭祀活动当中使用的这些器物是在哪儿造出来。所以接下来要进一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这样才能够还原三星堆古国都城的整体样貌。”冉宏林说。

新华社成都6月13日电

听文物讲故事

汉代已有分餐制，烧烤火锅受青睐

解了大半，等运到博物馆时，已经全部消失。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喻燕姣说，所幸当时及时抢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视若珍宝。

烤串火锅 五味俱全

像烧烤、火锅等如今广受欢迎的烹饪方式，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受到青睐。

从马王堆汉墓陈列展示的《轺侯家食谱》可以看到，随葬食品中，主食、糕点、腊脯制品一应俱全，烹饪方式涵盖了肉类类、烧烤类、煎炸类、涮火锅、蒸菜类等。当时的珍馐美味已有涮牛肚、涮藕片、烤鹿肉、串烤鲫鱼、煎焖鳊、煎焖小雀、鹿肉鲍鱼(咸鱼)笋白羹、蒸泥鳅、枣米糕等。

烧烤是出现较多的烹饪方式。在轺侯利苍家的食谱上，出现了牛炙、牛犊炙、烤牛脊、炙炙、鹿炙、炙鸡、串烤鲫鱼、串烤鲤鱼等种类繁多的烧烤食物。

味道好不好，调料很重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料，有辛夷、花椒、茅香、佩兰和桂皮等。卜楠说，汉代餐饮五味俱全。从墓中出土的豆豉、豆豉姜酱、花椒等调味品可以看出，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或“源远流长”。

分餐而食 宴饮千杯

汉代人分餐而食，用餐时席地而坐，一人

铜等五花八门，仿出来的样子也是惟妙惟肖。王娟告诉记者：“这些仿贝不一定行使货币的功能，可能是日常的装饰品，有的也替代海贝作为陪葬品。”

不要小瞧这些“迷你”的古物，它们身上蕴藏着文明探源的密码。范安川告诉记者，从环境考古研究的角度看，出土的海贝能揭示当年地理、气候等环境信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它又能展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暗藏中原、西北、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古代人群迁徙和贸易的路线图。

近年来，中科大科技考古团队正成为“科海拾贝”的一群人。他们收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现代海贝标本，以及中国古代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海贝遗存，建立现代与古代海贝样本库和数据库。在考古学已有发现的基础上，运用高精度测年、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示踪等技术以及地球化学背景数据库，从断代和溯源的角度给出新的信息，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助力考古。

范安川解释，海贝的碳酸盐壳体记录了多种环境信息，元素和同位素的种类和丰度主要与其生活海域的地质环境背景和生物代谢作用有关，能够体现区域特征，是海贝溯源的“指纹”。

“遗址中的海贝究竟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跨越山海，这些问题非常令人着迷。”王娟告诉记者，它们或许是直接从

海贝产地长距离运输而来，或许是经历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连续的贸易交换，“依托新兴科技手段，藏在贝壳里的秘密终有一天能解开。”(记者张紫贤、陈诺、刘美子) 新华社合肥电

遗址中的海贝，是怎样的宝贝

河南的殷墟妇好墓、陕西的周原遗址、四川的三星堆遗址……我国不少地方的考古遗址离海千里，却陆续出土大量海贝。数千年前，它们来自哪里？又是如何传播流通的？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技考古团队正在对海贝进行溯源研究。

在中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记者见到了大小不同、形色各异的古老海贝，它们来自河南安阳、四川广汉等国内多处考古遗址。其中，数量较多的是一种名为“货贝”的海贝，俗称“黄宝螺”。

“这种海贝分布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海南诸岛。”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中科大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研究员王娟告诉记者，“在世界范围内，它们广泛布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暖海区。”

小小的海贝，一度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中科大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范安川介绍，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作为装饰品的海贝出现；商周时期，“贝”字频繁出现于当时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

“我国殷商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货贝。”范安川说，根据对考古材料时空分布的统计，货贝出现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最为盛行，集中分布于中原地区，春秋时期逐渐减少，直到秦废贝行钱，在一些地区，海贝的流通延续更久。

在当时，海贝是适合作为货币的材料：量少难得、不易磨损、方便携带、容易计量。如货贝的成体在2厘米左右的长度，大小相似，重量接近，方便钻孔穿绳成串使用。有文献记载，成串海贝的单位是“朋”。“用古今单位换算，一朋能买好几亩良田。”范安川说。

有趣的是，当时的人们还挖空心思想仿制海贝，所用的材料包括骨头、蚌壳、玉石、绿松石、青